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三卷

上册

第二国际

1889—1914

〔英〕G.D.H. 柯尔著

商务印书馆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三卷 上册

第二国际

1889—1914 年

〔英〕G. D. H. 柯尔 著

何 瑞 丰 译

俞 元 开 校

商务印书馆

1981年·北京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Volume III, Part I

SOCIALIST THOUGH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4

By G. D. H. COLE

LONDON, MACMILLAN, 1956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 三 卷 上 册

〔英〕G.D.H.柯尔 著

何 瑞 丰 译

俞 元 开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1/32 16 $\frac{7}{8}$ 印张 402 千字

1981 年 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200 册

统一书号：2017·252

定价：2.10 元

目 录

前 言	1
导 言	3
第一章 第二国际的初期	11
第二章 第二国际的后期	17
(I) 1900 年——巴黎。(II) 1904 年——阿姆斯特丹。(III) 1907 年——斯图加特。(IV) 1910 年——哥本哈根①。(V) 1912 年——巴塞尔。(VI) 1914 年——维也纳和巴黎，第二国际的崩溃。	
第三章 英国——工党成立前的社会主义	113
(I) 费边社会主义的起源。(II) 新工会运动及其背景。(III) 独立工党。(IV) 罗伯特·布拉奇福德和《时代号角报》。	
第四章 英国——工党和大动荡的局面	191
(I) 工党的兴起：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H·G·威尔斯。	
(II) 费边社会主义——韦伯夫妇，肖伯纳和华莱士。(III) 大动荡的局面：工党及其领袖；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	
第五章 德国：关于修正主义的论战	262
第六章 修正主义论战后的德国：外表和实际	310
第七章 1905 年以前的法国	335
第八章 1905 年以后的法国。统一社会党和工团主义者。饶勒斯和索列尔	366

① 原文作阿姆斯特丹，这显然是作者弄错了，应该是哥本哈根，译者按实际情况把它改了过来。——译注

第九章	1905 年以前的俄国	403
第十章	第一次俄国革命	454
第十一章	波兰——罗莎·卢森堡	497
附：	主要人物表	529

前 言

v

本卷在撰写的时候是很难下笔的，因为社会主义已经传播到这么多国家，而且其中许多国家的资料在我所懂得的几种文字中又很缺乏。虽然我希望我所叙述的绝大多数要点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我无法指望谬误和判断不确之处都已得到避免。凡是能办到的，我总是请教我所认识的专家，承他们热忱作答，使我纠正了许多错误。H·N·布雷斯福特先生又一次通读了本卷全文，给我很大教益；社会主义者国际书记尤利乌斯·布伦塔尔先生不仅校阅了全卷，而且惠借了许多其他地方难以看到的书籍和报告，均此深志谢意。谈到借书，我还应该深切感谢雷蒙德·波斯盖特先生、H·L·比尔斯先生、C·A·麦卡特尼先生、新西兰的K·J·斯科特先生和弗洛伦斯·布雷德菲尔德小姐。我的妻子校阅了本卷的某几章，并且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我还应向其他许多人士申谢，他们为本卷的某些章节提供了资料和帮助，特别是详细的材料和传记细节。詹姆斯·约尔先生对于有关第二国际的一节曾惠予帮助，特此志谢；此外我要感谢：J·F·赫拉宾先生、莫里斯·雷奇特先生、A·J·彭蒂夫人、迈克尔·奥克斯肖特教授和约翰·马洪先生（英国）；莫里斯·多曼热特先生和米歇尔·格罗齐埃先生（法国）；尤利乌斯·布朗塔尔先生和吉尔特拉德·马加齐拉夫人（奥地利）；托马斯·巴罗格先生和K·齐吉提先生（匈牙利）；H·G·申克博士（波希米亚）；沙尔·巴比埃先生、马克斯·韦伯教授、汉斯·汉钦先生和瑞士消费合作社联盟（瑞士）；雷内·莱纳德先生（比利时）；封·韦斯博士、A·C·吕特尔教

授和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荷兰);保尔·汉森先生(丹麦);古斯塔·
vi 兰根费尔特先生、巴尔姆斯提尔拉男爵和J·W·埃姆斯博士(瑞典);B·兴达尔先生(挪威);R·H·奥伊提农先生(芬兰);L·瓦里亚尼先生(意大利);L·波波夫先生(保加利亚);V·童古兹先生(南斯拉夫);马约里·普兰特小姐、伊赛亚·伯林先生、库斯科瓦-普罗科波维奇夫人、鲁道夫·施莱辛格博士和亨利·柯林斯先生(苏联);H·W·奈德勒博士(美国);C·A·弗莱明先生、E·M·希金斯先生、N·S·林拉文先生和劳埃德·罗斯先生(澳大利亚);鲇泽岩雄教授(日本);弗朗西斯科·A·德·伊卡萨大使(墨西哥)以及戴斯蒙德·克罗莱先生、K·J·斯科特先生和E·G·辛普森小姐(新西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克罗莱先生曾惠借其有关新西兰劳工运动的尚未出版的大作,对我的确很有帮助。希金斯先生也曾将其有关澳大利亚的尚未发表的资料借给我。

最后,我的两位秘书罗莎蒙德·布罗德利夫人和奥德丽·米勒夫人相继承担了处理我的手稿的繁重工作,并且在许许多多其他方面予以帮助,特此志谢。

G·D·H·柯尔

1954年9月于牛津

导 言

xI

我在本书的第二卷中论述了 1850 年前后到 1890 年前后这段时期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的发展,也就是说从 1848 年欧洲各国革命失败时谈起,一直谈到了社会民主党或工党已经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和一些欧洲以外的国家成立时为止。本卷将继续往下谈,即从 1889 年(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第二国际建立时谈起,一直谈到 1914 年 8 月欧战爆发时为止。在第二卷所涉及的时期中,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中心论题。那场斗争在 1889 年并没有结束,只是在这个阶段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了,而且论战的双方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在整个西欧已经以社会民主主义的面貌出现,并且已经体现在一系列全国性政党的组织中。这些政党有的积极从事选举活动,力图通过合乎宪法的道路建立议会实力;有的则由于选举权限制过严,难望在选举中获胜,于是便进行鼓动和示威,要求成年男子选举权甚至成年人选举权,旨在步前者的后尘。在此期间,无政府主义正深受工会运动发展的影响,部分地体现为革命工团主义(这是最初的名称,后来简称为工团主义),从强调“直接行动”的作用出发,把总罢工当作武器,反对采取议会行动。社会民主党人也曾提出并利用总罢工作为贯彻选举制改革的武器。在俄国,1905 年的革命实际上就是以这种形式开始的。但是,奥地利和比利时用来迫使当局进行选举制改革的总罢工则跟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俄国革命主义者的“社会性”总罢工完全不同;奥地利和比利时的总罢工,其用意并非 xII 不是要引起激烈的革命,而是要赢得有限的宪法改革,从而为采取

有效的议会行动扫清道路。因此，这种总罢工是社会民主党指挥下的有纪律的行动，而不是富于战斗性的积极分子把工人主体争取到革命行动中来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即使是这种有限的罢工形式，也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反对；他们的党力量最为强大，组织最为完善，远远超过了其他社会党；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既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声誉卓著的捍卫者，又曾胜利地抵制了俾斯麦利用反社会主义者法摧毁它的尝试，因而威信也最高。当第二国际诞生时，德国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仍然有效，可是第二年便被废除了，于是德国的党便得以放手在德国的国土上合法地重建组织，并于1891年通过了新的爱尔福特纲领。这个纲领对其它国家的社会党的政策具有重大影响。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完全统一的，并且有效地指挥着德国的工会运动，后者在名义上独立于前者之外，但却忠实地服从前者的领导，因而德国的党在新的国际中，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都是一支最强大的统一力量。在影响和实力方面仅次于德国的是法国的党，但是在1889年，法国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分裂成为若干敌对的派别。在法国，不但有对立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有对立的工会运动；甚至在对立的党于1905年在国际的压力下统一起来的时候，工会运动仍然丝毫不愿意接受社会党的领导。在第二国际的历次大会上，法国的各个代表团一直有尖锐的分歧，而德国人则几乎始终代表一条坚强的统一战线。

地位次于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是俄国人，虽然俄国人没有群众组织，同那些可以公开合法地进行组织工作的国家不能同日而语。实际上，在1905年以前，俄国人在第二国际的活动中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甚至在这一年以后也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内部分歧。这种内部分歧不仅存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而且也存在于社会民主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但是俄国人

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革命主义者，面对着专制的沙皇政权，别无其他出路。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确曾有过一个议会——杜马，但其选举条件却堵死了社会主义者赢得强大代表权的一切机会，而且从任何角度来看，杜马的权力也是非常有限的。在沙皇俄国，根本不可能按德国或任何西方国家的形式建立一个以走议会道路为主的社会党。再者，虽然参加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一直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当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者，但是他们自己的处境却同支配第二国际议程的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如此不同，以致在多次讨论中他们都很难发言。他们参与讨论的最重要的一次是在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当时列宁和罗莎·卢森堡设法修正了一项有关社会党人在国际战争中应采取什么态度的决议。

结合英国的世界地位来看，英国社会主义者在第二国际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因为他们非但陷于分裂，而且在发展强大的政治运动方面也迟迟不前。英国职工大会虽然派了代表参加第二国际，但是并没有在国际的活动中起重大作用，而且简直没有认真看待参加国际这件事。工党在加入国际的英国支部以后也是无足轻重的。社会民主联盟和凯尔·哈迪的独立工党把它们之间的争吵从国内带入国际领域，这两个组织在英国代表团中平分秋色。凯尔·哈迪主张以总罢工反对战争，这使他在1905年以后成了一个主要人物，可是此外就没有其他英国代表为人瞩目了。海德门尽管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对德国的威胁持激烈见解，因而未能起主要作用。英国人由于未能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他们的工会运动在效忠于国际阶级斗争方面落后于人，因而在国际中不断受到指责。

在较小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奥地利和比利时人最为活跃。维 XIV
克多·阿德勒和艾米尔·王德威尔得都是国际上的杰出人物。奥

地利人主要追随德国的领导，但是对反对派的态度要和解得多；比利时人的地位最适于在条顿族和拉丁系各族人民之间进行调解，在工会与合作社同政党究竟处于何种相对地位这一问题上尤其如此。意大利人就象法国人一样，内部始终是分裂的，荷兰人也是这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的社会党人当时还没有上升到1918年以后所取得的那种重要地位。代表西班牙人的只有帕布罗·伊格列西阿斯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小党，这个党忠诚地追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巴尔干半岛各国只有一些规模很小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大部分受到严重迫害，其中最重要的组织——保加利亚的党则分裂为壁垒鲜明的敌对宗派。美国人也同样分裂为德·里昂派和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双方的信从者人数既不多，影响也不大。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只是时断时续地露面，对第二国际的活动影响很小。辩论通常主要是德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和比利时人的事；英国人，意大利人和荷兰人起着次要的实质性的作用；至于俄国人，则只是偶而参加，有所影响而已。

本卷的内容必然主要是分别叙述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情况，因为在1889到1914年期间，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主要是沿着国家的路线发展的。每个社会主义政党和每个工会运动，一旦加强了地位，取得了一定成就，而且组织也初具规模的时候，便都碰到了本身所特有的问题，并且都着手去满足其潜在支持者的要求和维护他们的利益。这实际上是赢得选举胜利和使工会运动成为一支坚强的谈判力量的必要条件；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虽然有时出于勉强，但也不得不承认有必要让每个国家的政党按照其工作所

xv 必须依据的条件，放手制定其政策和纲领。第二国际自始至终都只不过是各国社会主义集团的松懈联盟，对其成员的约束力非常有限。事实上，只有在意见大体上一致的时候，国际才能在政策问题上作出强制性决定，而且在号召采取积极行动时，也总是小心翼翼地拟

定决议，以便至少能取得主要代表团的同意。它尤其不敢冒犯在票决时行动一致的德国人，他们纪律严明，团结统一，虽然无力使自己的意见永远得以通过，但实际上却几乎享有无限制的否决权。

在第二国际的初期，讨论的范围很广泛，没有一个是突出的。接着就由于米勒兰事件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事件本身是德莱福斯事件引起的，争论的是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是否正当的问题；由于考茨基巧妙地起草了一个通常以他的名字为名的文件才避免了分裂。随后国际的注意中心就转移到促进社会主义者团结的方面去了，特别是促进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团结。1905年，当法国的各个派别经过劝导联合起来，而俄国的革命则于同年被镇压下去的时候，国际的主要注意力又转移到帝国主义大国之间日益增长的战争危机方面。1914年以前，国际一直关注这一问题，并曾夸口可以扭转各主要国家工人效忠自己祖国的立场；到了1914年，这种不实之词终于被戳穿了，而国际作为一个组织也随着欧战的爆发而彻底瓦解了。

随后，作为欧战的一个后果，发生了1917年的俄国革命；而在共产主义于俄国奠定基石以后，重建共同的社会主义者国际的可能性就消失了。因为新型的共产主义完全否定了组织松散的联合机构，这种机构在“自己存在、也让别人存在”的基础上，使得见解很不一致的团体实际上能够在一个统一的国际组织内共存。民主集中制的新信条，不仅在每个国家中，而且在国际上，都跟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内以国家为依归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所发展起来的议会社会主义完全不能相容。此外，这些政党经过战争以后，选举力量大部分都大大加强了，因而根本无意于放下议会权力不去追求，^{xvi}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世界革命。因此，当俄国人正忙于建立第三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工具时，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则着手重建一个以1914年解体的组织为楷模的国际。奥地利人及其在所谓的

维也纳“第二半”国际中的协作者曾作过尝试，打算把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拥护者纳入一个共同的组织，结果无效；无效并不是偶然的。只有集中控制的国际才能适合共产党人，然而也只有松弛的联盟性的国际才能符合那些志在按宪法规定夺取议会权力的社会党的需要。因为争取选民群众时，必须把提出各项直接要求的号召力最广的纲领放在首位，这些要求必然因国而异，而且凡是既有广泛的选举权又有责任代议制政府的地方也正是革命性可能最缺乏的地方。只要具备这些条件，走议会道路的社会党都势所必然地主张发展“福利国家”，而不主张发动彻底的社会革命。它们也不能让自己的国际主义观点比基本选民更浓厚，因为要取得政权，就必须赢得基本选民的支持。

所有这一切今天看来要比四、五十年前明显得多了，那时革命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还能够在一个共同的国际中进行活动。1914年以前，选民遍布各阶层，同时又有充分的责任代议制政府的国家是很少的，其中有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此外就寥寥无几了。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享有广泛的选举权，但是没有责任制政府。俄国人则两者俱缺。意大利人快到1914年的时候才扩大了选举权。在西班牙和不少其他落后国家，则选举名单以至选票都可以由当局操纵。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之间就不可能清楚地划出一条分界线来。

xvii 在俄国，甚至连温和派也不得不走革命的道路；而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则都不可能成为单纯的立宪主义者，因为他们都必须面对不能单凭宪法手段去推翻的专制政权。虽然德国和奥地利的党实际上都是改良主义的党，但是两党都一直宣称信仰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而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王朝都垮了台以后，革命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之间才有了明确的分界线，并且把世界工人阶级运动分割为两个无法调和的成分。这样，也就为法西

斯主义而不是为世界革命敞开了大门，而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相信，没有这种世界革命，他们自己的俄国革命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曾为本卷的定名思考很久，最后决定把它叫作《第二国际》，因为我找不到真正令人满意的书名。虽然我很想把议会行动与直接行动这个主题放到书名中去，但“社会民主主义与工团主义”这个名称似乎又太狭窄了。“革命还是改良？”这个名称是不能用的，因为我已经说过，1914年以前，在革命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之间是无法清楚地划出分界线的。我所选用的书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所强调的完全是组成国际的那些政党，而把工会以及整个工人阶级运动的其他组成成分排除在外。然而，这毕竟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好书名了，而且无论如何它确实准确地显示了我所要包括的时期。当然，在少数情况下，我发现有必要回溯到1889年以前去，或者是把某一个运动的历史叙述到1914年以后。如果上天假我以年的话，下一卷大概要把这部历史写到1939年。

第一章

1

第二国际的初期

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结束的时候，主要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楷模的社会民主党——至少是它的雏形——已在一些欧洲国家存在；看来这些党在一个新的国际中联合起来的时机已经来临。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分裂以后，它在欧洲的残余组织已经转移到拒不接受马克思的独裁领导的工联主义者手中。但是如前所述，这个工联主义（通称“无政府主义”）国际在七十年代已经逐渐消失了。1877年，它在比利时的韦尔维埃召开了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就在同年为重建一个包括各方的国际而召开的根特社会主义者统一代表大会以前不久。在根特代表大会上，无政府主义者和主张采取政治行动的人之间又恢复了习以为常的论战。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投票中被击败了；大会决定在韦尔维埃设立一个国际联络与统计局，持有各种见解的组织都可以参加。但是这个机构从未实际成立。面对着大会上所出现的无法调和的分歧，主张政治行动的多数派抛开无政府主义者，自行召开了一次会议，并设立了一个联合局，指示它另行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关于采取这一行动，同无政府主义者集团决裂的决定，其签署人中有西萨尔·德·巴普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前者曾经是工联主义国际的领导人，后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其它签署人还有苏黎世社会民主党领袖赫尔曼·格雷利希，路易·贝特朗和其他几个比利时人；此外还有米兰的T·查纳德里（他已经与意大利同道决裂），匈牙利的列奥·弗兰克尔，法国的安德列·伯

尔,以及英国代表约翰·黑尔斯和马尔特曼·巴里两人。

这种发展预示着第二国际的到来。但是,在根特成立的联合局尽管于1881年在瑞士的库尔召开了另一次国际代表大会,而事情却到此就告终了。李卜克内西和路易·贝特朗分别作为德国和比利时党的代表来到库尔;法国工人党和美国社会主义劳工党也都派有代表参加:前者派的是前巴黎公社委员边诺阿·马隆和茹尔·约弗兰,后者派的是木工兄弟会的书记P·J·麦克吉尔。但是大会大部分成员是瑞士德语区的代表,其中包括忠贞的老战士日内瓦的J·P·贝克尔。此外,俄国的保尔·阿克雪里罗得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大会;到会的还有少数几个代表流亡集团的波兰人。英国或荷兰,西班牙或意大利,都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未被邀请与会的无政府主义者正忙着在伦敦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会上建议成立一个明确的无政府主义国际。

库尔代表大会上的辩论虽然涉及的范围很广,但是所得出的结论却是建立社会主义者国际的时机尚未成熟。除了德国以外,其他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一个组织完善的社会党,只有比利时的党正在向组织完善的方向发展。德国当时仍在实行反社会主义者法;因而在国际方面不能率先行动。在法国,茹尔·盖得的工人党还在草创期间。根特代表大会在一个难得遇到的意见协调的时刻曾决定组织一个工会国际,并且决定应为此召开一次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但实际上并没有人着手召集。这种工会国际也不是德国人所希望的,因为它既不能把无政府主义者拒之于会外,也不能不让反对工人阶级采取独立政治行动的温和工会主义者与会。因此,在库尔代表大会以后便再也没有举行过代表大会;建立新社会主义者国际的想法虽然从未放弃,但被无定期地搁置起来了。

不过,复苏国际的企图不久又在法国人的带领下重新抬头。
3 法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在八十年代初期迅速地恢复起来,但却分裂